【政党研究】

数字化政党:一个非类型学的理论框架

丁 辉

【摘 要】当代政治生活的数字转向塑造了以实时、互动、算法为基本特征的全新政治逻辑,不仅推动"社会人"走向"数字人"的数字解放过程,更对当代政党提出了在技术上和伦理上进行转型调适的总体要求。有别于迄今各种静态化的数字政党类型学,数字化政党概念强调当代政党的数字转型是一个动态可变的混合过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议题算法化、参与平台化、竞争社交化的工具语境下的技术混合;二是在激进的数字建构战略和温和的数字革新战略之间进行选择和平衡的战略混合;三是在改革调适的预期目标和非预期风险之间的结果混合。作为一个非类型学的分析框架,数字化政党概念揭示了政党在数字时代生存延续的发生机制,开辟了一项数字化转型竞争类型学的研究议程,指向了对西方中心主义政党研究定式的反思和超越。

【关 键 词】数字民主;数字化;数字化政党;政党类型学;政党变迁

【作者简介】丁辉,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原文出处】《政治学研究》(京),2024.1.236~251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政党治理数字化的类型学与中国模式研究"(23BZZ014)的研究成果。

当代政治生活正在日益卷入不断加深且不可逆转的数字化时代潮流。一方面,随着移动智能通信手段突破传统的时空局限,各种社交媒体为个体进行即时性、碎片化、去中心的表达与互动提供多样化的垄断平台,推动了线上生活和线下生活的深度融合。另一方面,基于海量数据的信息抓取、分析与解读,无处不在的"数字之手"对政治生活的观察与塑造在鸟瞰视角和显微视角之间切换自如。当以"社会人"(homo sociologicus)为基础单位的公民生活逐渐转化为以"数字人"(homo digitalis)为基础单位的公民生活,"数字人"的政治生活是否还需要被组织起来[①]?尤其重要的是,作为前数字时代把"社会人"组织起来的最重要的政治机制,政党是否还能继续发挥把"数字人"组织起来的功能?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数字化是否意味着政党使命的完结[②]?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数字化是否意味着一种全新政党类型的形成[③]?

为了深入理解数字化对政党的影响,本文首先剖析当代政治生活数字转向的本质逻辑及其对政党民主构成的挑战,并对当前主流的工具论和本体论等研究进路展开批评性分析,指出静态化的数字政党类型学存在诸多弊病。然后,尝试从混合化的视角理解政党的数字化转型,建立起一个不同于类型学进路的原创性解释框架——数字化政党。在此基础上,从工具语境、转型战略与转型结果等维度出发,论证政党数字转型过程的可变性与结果的混合性,揭示政党在数字时代的生存活力与延续潜力。本文指出,当代政治生活的数字转向并未迫使政党退场,也并未创造一种全新的政党类型或者政党家族,而是推动政党走向普遍的数字化转型。

一、当代政治生活的数字转向

(一)从信息化到数字化

数字化是信息革命的全新阶段。直至20世纪末,信息化概念的标志属性仍以"电子"(electronic)或

其英文简写前缀“E-”为主，都更多指向信息化的物理性质而非其内容性质，强调信息化的工具价值而非目的价值。诸如电子民主、电子政府、电子政务、电子参与等概念，更多是从信息处理速度与信息存储容量出发，侧重民主过程和治理实践能够被改进和优化的可能潜力。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和移动智能通信的迅猛发展，“网络”(network)、“数字”(digital)等词汇相继得到广泛使用，逐渐取代“电子”，成为标记信息时代的关键特征。如果说“电子”更强调信息载体的物理属性，那么“网络”则揭示出信息传播的结构属性，而“数字”进一步揭示出信息生成的基因属性。从这种意义上讲，一部从“电子”到“网络”再到“数字”的数字化历史，就是个体生活和社会生活从等级关系走向网络关系，并被转译为数据点和数据矩阵的历史。当“大数据”(big data)形成了贯穿宏观社会与微观生活的通约规则，把生活世界数字化，虚拟世界因其高度的精确性、复杂性、公开性以及透明性，成为比现实世界更接近真实的“数控世界”(cyberspace)。

数字化改变了现代政治生活。其一，弱化时空制约。如果说古典政治生活完全依赖于本地社区的城邦或宗族传统，而印刷资本主义将现代政治共同体推向了基于认同原则的民族建构，那么当代政治生活则因信息科技革命克服时空限制的努力不断迭代，从而激活了“全球化—本土化”这一张力轴线上的各种建构和解构共同体的政治生态诉求[④]。其二，造就数字生态。如果说电子化更多具有认识论意义，强调信息手段对政治生活的技术支撑，但政治生活和生活世界仍保持着清晰的边界的话，那么数字化则包含了强烈的本体论意义，强调数字技术、社交媒体无法与社会剥离，而是构成社会存在的实质内容，甚至统摄了人作为主体的存在本身，就成为取消线上与线下差异、模糊在场与缺席界限的“元宇宙”[⑤]。

总体而言，政治生活的数字化呈现出从“社会人”转向“数字人”的趋势。这意味着，无论是社会行动还是共同体建构，都越来越依赖作为数据点的个人，依赖大数据所反映的观察和判断，依赖即时智能通信设备和线上社交网络，而越来越少的单纯依赖物理空间中因人际接触而形成的线下社交网络[⑥]。不容否认，数字化并不是一个同步均质化的过程，围绕着数字知识储备、数字产品消费、网络接入权限等数字生活资料的占有权问题，在群体和群体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数字鸿沟[⑦]。但是，随着数字软硬件服务价格的不断下降，以及数字技术创新具有的开放共享特征，数字鸿沟不断缩小，并且存在被超越的可能性。正如汽车和电脑虽然迄今都无法完全实现全球普及，但不妨碍它们逐渐改变现代世界一样，数字鸿沟固然存在，却无法阻挡人类社会的数字化趋势：人将首先是“数字人”，才是“社会人”，人作为数据的存在，将在逻辑上先于人的存在[⑧]。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数字人”有别于“社会人”的关键，并不在于取消人的非数字生活属性，不是“社会人”的彻底消失，而是走向“社会人”的数字存在。换言之，传统的“社会人”特质部分地消失，部分地实现数字转化，部分地叠加了全新的数字特征，导致人和非人的数字技术之间不再是彼此界限分明的主客体关系，相反，二者之间相互依赖和高频互动不可逆转，发展为一种模糊主客体界限的混合生态[⑨]：人依赖于数字而存在，在数字中存在，作为数字而存在。最终，在瞬时性和实时性的基础上，在滚动更新的海量信息算法推送下，“数字人”成为网络化的关系性权力结构中的行动节点[⑩]。

(二)数字解放与政党民主

政治生活的数字转向创造了全新的政治逻辑。第一，支配数字生产场景的实时逻辑。当海量数据的计算、存储和传递能够在接入网络的条件下瞬时高速完成，就攻破了传统意义上由于地理空间区隔所造成的信息壁垒，使得信息传播、社会互动获得无延迟、无中介的现场性(liveness)。换言之，作为数字空间意义上的在场者，“数字人”拥有了克服物理时空意义上的社会行动在场难题的巨大潜力[⑪]。第二，支配数字行动场景的互动逻辑。实时性要求信息沟通的及时更新、及时回应，使网络化的“数字人”深度卷入具有高度灵活性、自发性、临时性的社会互动循环。这一互动逻辑从根本上重塑了政治生活的基本

伦理，重新定义了什么是有价值的和有效率的政治行动，对政治行动者提出了完全不同于前数字时代的行动预期[12]。第三，支配数字再生产场景的算法逻辑。互动伦理要求对各种模块化的数据进行持续不断的组装、拆解和重装，完成用户需求敏感型的产品供给。随着海量数据的不断累积、沉淀，如何使用数据就催生了算法政治。在数据服务特定的战略目标、瞄准特定的战略对象，进而被挖掘、重组和投放的整个过程中，算法设计与算法运用构成了数字权力关系的新型枢纽。信息径流诉诸包括文字、图片、视频等媒体形式的混合，为各种政治行动者快速地建构真相和发表叙事创造条件，在舆论引导和民意操纵的张力之间寻找定位[13]。

数字化的政治逻辑要求民主政治的数字解放。长期以来，代议制民主之所以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形式，主要是基于一种技术上退而求其次的排除逻辑。这种逻辑假定，直接民主虽然是更为理想的“纯粹”民主，但只适合政务简约的小国寡民，而对于地广人稠、政务繁巨的现代国家来说，实行间接民主，由少数人去代表人民进行统治，则是虽不完美却更为可行的方案。对这一排除逻辑的正当性的质疑从未停止。20世纪70年代以来，参与民主、协商民主等一系列理论相继兴起，不仅在规范层面上批判代议制民主，也提出了一些在实践中提高民主参与水平的政治实验模式，但面对一系列经典技术难题依然束手无策，尤其是如何确保大规模群体决策的同时性以及海量信息的充分传播等等。21世纪以来，数字化在相当程度上开拓了克服这些障碍的可能性，消解了代议制民主和直接民主之间的根本张力，形成了对二者的补充、扩展和联结，让一直带着技术镣铐跳舞的民主政治看到了社会行动获得解放、跃入自由王国的曙光[14]。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字解放意味着，现代民主政治有可能通过诉诸数字革新，打破囿于技术障碍而形成的正当性瓶颈，实现自我革命。

虽然数字解放能否拯救代议制民主，其长远前景还有待时间考验，但已经从理论逻辑和现实发展上构成了对政党民主的根本挑战。毕竟自现代政党诞生之日起，围绕着如何看待政党和民主政治的关系，一直争议不断。一派认为，政党对民主不可或缺，是以普选为核心的民主竞争与民主参与的关键组织，是代议制民主确保公民进入国家治理的关键链条[15]。另一派则认为，政党无法保障民主，从“寡头铁律”到“全民党”，再到“卡特尔政党”，无一不是指向政党的科层化、同质化和精英化[16]。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鉴于西方各国主要政党的党员数量普遍大幅下降，“政党衰亡论”大行其道，政党作为一种党员组织走向萎缩衰落的趋势似乎已是必然[17]。不仅如此，代议制民主也日益受制于治理导向的朝野政党联合，蜕变为精英化的“弱竞争民主”[18]。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生活的数字解放不仅挑战代议制民主的正当性基础，也挑战了政党的不可或缺性，更进一步为政党衰亡命题给出了最新证明。一方面，数字解放为更直接和更开放的政治参与创造了条件，当政党无视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继续死守自身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中介代理角色，固步自封于科层化的封闭线下组织传统，那么，面对着追求实时性、互动性、开放性政治生活的“数字人”，政党将彻底失去代表、动员和吸纳的能力[19]。另一方面，数字解放推动了民主政治和国家治理的去魅化和透明化，当政党继续死守选治分离的精英民主传统，固步自封于竞争弱化、问责弱化、回应弱化的垄断治理集团定位，则在趋向于网络化的关系性权力结构中，面对基于平台和算法的去组织化、去中心化的数字行动者，政党将彻底失去支配民主政治和国家治理的现实正当性[20]。然而，正如下文即将指出，数字解放在对政党民主提出严峻挑战的同时，也为之开拓除旧布新的改革空间。政党能否及时恰当地针对政治人的数字解放做出积极敏锐的回应与调适，相应地重塑自身的中介逻辑和组织生态，重获独特的竞争优势，才真正决定政党在数字时代的最终命运[21]。

二、政党的数字化转型：理论评述与替代性分析框架

政治生活的数字转向并未迫使政党退场，而是推动了政党走向数字化转型。相关研究日益丰富，

其中的关键分歧在于，数字化转型究竟是构成了政党的一般性特征，指明了所有政党发展的共同趋势，还是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裂隙，指向一种全新的政党类型和政党家族[22]。围绕上述问题，学界主要形成了两种研究路径，依循不同的方法论取向，各自所采纳的概念和观点也截然不同。

(一)类型学进路的方法论批判

第一种研究进路持技术驱动的工具论立场，假定政党组织发展的决定因素是技术，数字技术革新推动政党走向数字技术型政党[23]。从命名学上来看，无论是提出“赛博党”(cyber party)还是“网络党”(network party)，都强调数字网络技术为政党的内部组织和外部竞争带来便利，降低组织和参与的成本，提高动员和连接的潜力[24]。从类型学传统上来看，强调政党组织类型之间存在辩证关联，数字技术主要是对传统组织工具起到辅助与改进作用，而不是带来策略工具包的全盘更替。换言之，政党采纳和运用数字科技，是适应时代发展要求、走出组织困境的必然选择，借以维系自身政治中介角色的不可或缺性[25]。从这个意义上讲，工具论进路强调政党组织发展的前沿趋势，但并不指向特定的政党家族或政党类型，亦不考虑政党因应数字化冲击的能力、战略和效果的差异。

第二种研究进路持技术建构的本体论立场，假定数字技术不仅是政党发展的外部因素和辅助工具，还成为定义政党的结构部件与过程机制，催生数字基因型的“数字党”(digital party)[26]。首先，“数字党”是反卡特尔化的政党。二者都试图降低对正式党员的依赖性，但解决方案完全不同。卡特尔政党偏向国家权力，强调政党卷入国家治理的程度，数字政党则偏向网络社会，强调政党顺应民意舆论的水平。其次，“数字党”是生态化的政党，致力于降低组织门槛和淡化组织边界，将自身打造为开放的、渗透性强的生态群落[27]。最后，“数字党”是“数字人”的政党，锁定教育水平良好的年轻网民为动员目标，服从植根于实时性、互动性与算法逻辑的数字伦理，强调以线上数字平台取代线下科层组织[28]。简言之，本体论进路主张数字基因型政党是数字时代成长起来的新型政党，从成员基础、组织逻辑到功能定位都和兴起于前数字时代的政党类型截然不同。

以上两种进路都存在明显的缺陷。其一，无法解释政党数字化转型的分化与差异。一方面，工具论忽视了政党在如何认知、学习与应用数字技术等方面存在千差万别。另一方面，本体论忽视了并不存在公认的、排他的数字政党基因代码。在研究实践中，究竟是把政党的数字转型判定为工具论意义上的技术转型，还是归之于本体论意义上的基因建构，往往成为具体学者的独断选择，争议也就在所难免[29]。其二，都是相对静态的类型学概念，没有考虑时间变量的相关性[30]。一方面，政党对数字技术的理解、学习和回应，会存在态度、方式、战略和节奏上的变化，更会因政党竞争和政党体系变化而发生重大调整。另一方面，政党体系和政党生态存在路径依赖，并不因数字时代的到来而发生前后无涉的传统断裂和跳跃式发展，相反，无论新旧政党，一旦推进任何数字改革，都会因遭遇来自既有制度常规的抵制、俘获乃至驯化，遭遇非预期后果。

从根本上讲，无论是工具论进路还是本体论进路，都是基于经典个案的启发式类型学，试图通过建立特征鲜明的理想型，获得不为具体现象所遮蔽的“客观知识”[31]。但是在研究实践中，这种韦伯主义的类型学存在非常明显的弊端，要么把经典个案约等于理想类型，沦为过度拔高的简化论，要么不得不打上各种例外主义的经验补丁，削弱类型学本身的范畴精确性。特别是在政党研究传统中，沿着“干部党—大众党—全民党—卡特尔党”的轴线所展开的类型学谱系，具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大都是从个别西欧国家的个别政党出发，宣布归纳出具有普遍解释效力的政党组织类型[32]。这些类型学概念一旦跳出其母版政党的生存语境，就不仅失去了指向“理想型”的典型性，也失去了跨越地理区隔和制度环境进行“概念旅行”的比较潜力[33]。

数字政党类型学同样落入了理想型的方法论窠臼。相关研究的代表人物意大利政治学家保罗·杰保多(Paolo Gerbaudo)坦承，数字政党不是精准匹配经验的现实型，而是超越经验的理想型，并不能据此

对具体某一政党组织作出严格而精准的属性判定[34]。问题不止于此，因为杰保多自己所提出的颇具影响力的“数字党”概念也并非凭空而来，其主要复刻的母版政党乃是意大利政坛近十年来异军突起的“五星运动”(Movimento Cinque Stelle)。由于他把数字政党的组织要素和运作逻辑与“五星运动”的某些早期静态特征捆绑得过于紧密，不仅制约了这一概念的跨国比较分析潜力，更没有为数字政党的动态发展留下充分的解释空间。当“五星运动”随着自身的发展变化而逐渐背离其早期特征，“数字党”的类型学意义也大打折扣。2018年以来，“五星运动”一度在意大利政坛如日中天，持续入阁执政，在不断靠近建制派政党的主流化过程中，放弃了诸多激进的数字民主主张和做法。这样一来，不但削弱了“五星运动”作为“数字党”的典型性，更引来对数字政党类型学自身研究价值的尖锐质疑：“数字党”究竟是值得投入长期理论关注的概念范畴，还是会步德国海盗党(Piratenpartei)的后尘，成为转瞬即逝的过渡现象[35]？2022年意大利全国大选之后，“五星运动”损失了四分之三的国会议席，从连续执政的第一大党沦为排名第四的在野党，曾经的数字楷模如今变得前景黯淡，让这一质疑变得更加具有理论颠覆意义。一言以蔽之，忽视差异和变化，过度依赖经验中的母版政党，加之以过度理想化的抽象概括，则母版政党一旦发生戏剧化转折，足以让类型学建构变得头重脚轻而失去解释力。

(二)数字化政党：一个混合化的替代性框架

鉴于既有类型学的不足，本文提出“数字化政党”作为一个替代性概念框架，兼顾政党数字转型的要素趋同和表现差异，致力于保持对趋势的敏感度和差异的包容度，避免因执着于类型划分而导致概念僵化和掉入经验盲区。和前述的两种类型学进路不同，数字化政党既不是静态描述的现实型，也不是抽象超越的理想型，而是包容横向比较差异和纵向时间演化的动态比较框架。在这一框架下，政治生活总体上的数字转向形成了由多重行动逻辑交织错叠的数字化生态，因此政党的数字化转型并不能依循简单的静态类型学进行整齐划一的归类定位。相反，政党的数字化转型一方面是政党行动的选择，呈现为一个多战略的可变过程，造就暂时性的转型结果，而并不是按照特定的转型模版完成一次性永久浇铸。另一方面是组织生态的演化，呈现为一个多元化的混合化过程(hybridization)，造就混合性的转型结果，而不是完全独立于组织内外环境的单一有机体。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字化政党不是替代或者补充已有的政党组织类型学，而是一个有可能用来展开类型学分析的顶层概念(overarching concept)，可以通过建构类型学来描述或者解释差异化的混合过程与混合结果[36]。

数字化政党概念立足于政治传播学中的混合理论[37]。混合理论强调，社会技术系统的演变导致出现组织混合，不仅内部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发生相应转换，而且组织之间的跨界流动性互动增强。一方面，组织边缘呈现模糊性和可渗透性，划定的组织边界也可以被淡化和跨越。另一方面，组织内外的元素流动和生态交换并不是粗暴取代的新旧交替，而是充满排序博弈与主导竞争的动态共存[38]。换言之，技术革新并不带来全新的组织生态类型，而是推动已有的组织生态进行不同程度的自我革新和调适，实现新旧技术逻辑的混合搭配与分工平衡。进一步而言，互联网的混合本质决定了数字时代的政党不再是封闭的、有边界的自生系统(autopoietic system)，而是开放的、互动性的共生系统(allopoietic system)，既积极地吸收并混搭各种前数字时代的技术元素与“社会人”的组织生态，也驱动传统格局下的政治精英、媒体精英和积极公民适应和采纳“数字人”的政治逻辑[39]。

从混合理论出发，政党的数字化本质上就是混合化。第一，工具语境维度上的技术混合。政党的数字化水平不取决于数字技术的替代比例，而在于面向各种技术选项的开放程度。数字化政党的技术工具箱是开放性的，而不是唯数字技术至上，以非数字技术为落后禁区。通过组合数字媒体和传统媒体，连接线上政治和线下政治，打通选战政治和日常政治，可以将原先分别专属政党、社会运动、利益集团乃至商业公司的行动策略进行不同程度的重组、

切换与升级[40]。第二,政党行动维度上的策略混合。所谓多战略、多速度的数字转型,其理论关切并非穷举战略选项和速度挡位,而是强调政党的决策差异与行动潜力,即数字化政党采取哪种技术混合模块才是最合适的,这并非价值问题,而是策略问题,取决于政党如何认知和评估自身在数字化时刻所承受的内外改革压力与资源比较优势。不仅如此,不同策略之间也并非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可以根据具体议题和时空情境进行调整和组合,主要包括支持者的结构层次与辐射半径,线上政治和线下政治的混合比例,社交平台和政党平台的分工平衡等[41]。第三,组织生态维度上的结果混合。所谓多层次、多元化的数字化转型,其理论关切并非对转型结果进行精准的比例测算和排序评估,而是强调转型结果不是非黑即白,既非一味盲目的数字乐观,认为技术带来政党组织的全面升级,也拒绝彻底消极的数字悲观,认为技术造成政党组织的全面淘汰。相反,转型结果往往内容糅杂,喜忧参差。下文将指出,数字技术工具和数字政治逻辑在推动政党组织生态创新的同时创造新困境,譬如被数字霸权所俘获,或放大旧难题,譬如数字鸿沟加剧不平等,甚或两种问题兼而有之[42]。

总体而言,和已有的数字政党研究进路相比,本文提出的数字化政党概念具有创新性,不是另起炉灶建立新的政党类型学,也不是给出标准化的政党测量标尺,而是致力于兼顾数字技术的工具价值和本体价值,建构一个基于混合化理论的弹性分析框架,立足当代政治生活的数字转向,突出政党数字化的过程可变性与结果混合性。一言以蔽之,本文提出混合化分析框架,尝试跳出政党行动和数字环境的主客体二分格局,强调政党数字化转型不是政党完全被动重塑的过程,也不是政党完全自主行动的过程,而是在数字技术塑造和约束的条件语境中,由政党逐步展开有限调试的差异化混合过程。从这一基本假定出发,下文将从转型语境、转型战略、转型风险等三个维度具体展开讨论混合化分析框架的主要内容,合力阐释政党数字化转型是如何被条件和能力共同塑造出来的。

三、数字化政党的工具性语境:算法化、平台化与社交化

作为政党数字化转型的框架性概念,数字化政党的第一个分析维度是转型语境,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数字化对政党提出了什么样的革新要求;其二,政党视野里有什么样的数字化选项。如前所述,政治生活的数字转向创造了多重全新的政治逻辑,当支配数字生产的实时逻辑、支配数字行动的互动逻辑、支配数字再生产的算法逻辑交错叠加,就从议程、参与、竞争这三个维度上重塑了政党民主的工具性语境。

(一)议题算法化

政党数字化转型时刻的工具性特征首先体现为议程设定维度上的议题算法化,在数字生产逻辑和数字再生产逻辑的叠加作用下,政党从内驱型的政策生产模式转向外驱型的政策供给模式。以大数据和机器学习为技术支撑,围绕着海量信息的数据生产、挖掘与分析,算法设计与算法应用成为政党认知和回应民意的重要工具,成为政党筛选、抓取和引领政策议题的主要途径。

议题化(issue-orientation)本身并非新鲜事。早在数字时代到来之前,个体投票行为就不再锚定政党站位,而是转向因人而异、随事而转的议题导向,围绕着党员的政策利益而非固定的地理边界、群体身份等而展开,更强调利益集团和政策专家影响议题的潜力[43]。相应地,政党也不再死守意识形态纲领和社会裂隙分野,而是试图通过对具体政策、突发事件等焦点议题进行筛选、操纵和传播,突出自身的议题关联性和议题竞争性,占据选举心理学意义上的“议题所有权”(issue ownership),进而影响选民投票结果[44]。不过,由于在政党的政策供给和选民议题诉求之间缺乏算力强大的精准匹配机制,议题化存在十分明显的消极后果。一方面,选民个体必须承担起对不同政党的多重“议题所有权”进行评估的艰巨任务,导致政治参与成本大大增加,投票决策行为的不负责任与反复无常[45]。另一方面,政党所掌握的民意评估工具算力过低、误差较大,不仅难以增强民意捕捉能力,反而会失去战略

稳定性，极端情况下会严重误判选民的议题诉求，最终遭到败选惩罚[46]。

进入数字时代，信息数据的生产和再生产、传播与推送的技术条件日趋完备，推动议题化走向算法化，实现政党和选民之间的议题供需精准匹配成为可能。作为“数字人”的公民个体无须具备很高的教育水平、经济实力和政治兴趣，也无须自身花费大量精力主动投入信息搜集、信息分析和信息评估等工作之中，而是可以由信息的存储与计算功能强大的数据服务器来整理个人偏好，了解政党政策立场，从而在保障选民相对于政党的独立性的同时，大大降低参与成本，提高投票质量[47]。

议题算法化的典型例子是近年来发展迅猛的各种投票建议APP(Voting Advice Applications)。投票建议APP并非日常的政治参与辅助软件，而是仅在所服务的特定选举前限期开放，供参选政党和有投票资格的选民注册使用。投票建议APP通过测量和比较各政党和选民之间的政策距离，为选民提供筛选政党和候选人的具体投票建议。一方面，投票建议APP拆分转包了和政策议题相关信息的搜集与分析环节，降低了选民的投票成本和政党的选战成本[48]。另一方面，投票建议APP服务于数字选民的中立化需求，由独立于政党的传媒企业、研究机构、公共智库等第三方机构建立，具体建议以量化的客观分数为基础，拥有不同于传统议题化选战方式的公信力[49]。从用户数量上看，在不少较早开始发展投票建议APP的欧盟国家中，投票建议APP用户占选民比例已经普遍达到1/3以上，其中荷兰和芬兰已经达到1/2[50]。德国的Wahl-O-Mat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用户量最高的投票建议APP，自2002年上线迄今，使用总量已达1.1亿人次，最近一次的2021年联邦大选为2130万人次，超过同期合格选民人数1/3，接近实际投票人数的1/2[51]。从用户评价上看，投票建议APP已经排在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渠道之前，成为选民用户更加倚重的选举信息来源，不仅拓宽其选举视野，还能影响其选举行为[52]。

(二)参与平台化

政党数字化转型时刻的第二个工具性特征是政治参与维度上的平台化，在数字生产逻辑和数字行动逻辑的叠加作用下，政党从封闭性的党员组织逻辑转向开放性的用户服务逻辑。如前所述，数字解放打破了线下政治参与的面对面场景壁垒，以实时互动的在线行动重新定义了政治参与的“在场”标准。当参与个体的“在场性”不再绑定单一的线下场景，而是取决于网络平台提供技术支持的边际潜力，并内化出更具规范意义的互动参与伦理，则政治组织的中介作用和划界作用就大大削弱。作为混合生态的政党，就必须超越原先自行定义的身份边界和行动结构，以低门槛的平台用户身份取代高门槛的组织成员身份，以去中心化的网络平台取代中心化的科层等级。

根据向用户开放的程度，政党所介入的政治参与平台可以分为第三方运营平台和政党运营平台两种类型。顾名思义，第三方平台是非政府的、非政党的平台，又分为狭义的第三方平台和广义的第三方平台。狭义的第三方平台如前述投票建议APP，不是强调内外有别的强制性组织，不要求用户承担任何义务，本质上是一种非商业性的公益咨询平台，为选民提供政策信息和投票分析，分析和比较自身与政党的政策立场的亲疏异同。投票建议APP把政策信息的筛选、集成、化简等环节从原属政党的组织功能中拆分剥离出来，形成一种细分的公益服务分支，制衡政党对选民的信息操控和偏好塑造[53]。不过，投票建议APP虽然面向全体合格选民，但和选举周期绑定，开放时间受到严格限制，并不是日常化的参与平台。

与投票建议APP平台的强限制属性不同，网络社交媒体是更为开放的广义第三方平台。社交媒体的类型、数量、功能也高度多元化，并不聚焦细分的政治领域，更不受特定的选举周期约束。准确地说，社交媒体面向“数字人”社会生活各方各面，是全景化、全天候的平台生态，不仅受大众传播娱乐化的深度影响，还受制于市场化的商业运营逻辑[54]。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党无法垄断社交媒体上的议题所有权，任何政治力量都可以借助社交网络的技术生态支持，避开强调边界、身份和等级的传统政党组织模式，将目标群体动员起来参与到政治过程之中。无

论是去政党化的社会运动，还是去组织化的线上政党，都可以借助一种或多种社交媒体的公共服务属性，摊薄自身介入和影响民主政治的成本，达到政治传播和政治动员的目的[55]。

第二种平台模式是政党自营平台，主要是政党的官方网站及其移动客户端。和第三方平台相比，政党平台存在自身定位上的张力，要处理封闭式的线下组织传统和开放式的线上平台战略之间是否保持平衡以及如何保持平衡的问题。一方面，如果强调线下组织传统，则政党自营平台更倾向于等级化组织科层与发散性传播渠道的线上版本，其单方向的动员属性大于互动式的参与属性。譬如大多数建制派政党的官方网站，更多是单方面提供政党信息的中心化媒介门户，虽然其内容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标准化和公开化，但主要定位仍旧是发散端点而非连接节点，并没有为政党支持者提供实时互动的参与机会[56]。另一方面，如果强调线上平台战略，则自营平台也就不仅停留在线下组织的复制品层面，而有可能为注册党员或者注册用户提供参与机会。譬如，意大利“五星运动”的官方网站“卢梭”(Rousseau)，以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的名字命名，意在彰显自身是具有直接行动能力和行动效果的协商平台和决策平台[57]。总体而言，政党自营平台反映本党视角下的本党知识和本党立场，并不追求面向全社会的客观中立和彻底开放。政党平台往往成为政党领袖的造势工具，平台参与则是党内群众对政党领袖战略倡议的背书机制[58]。

(三)竞争社交化

政党数字化转型的第三个工具性特征是政治竞争维度上的社交化，在数字再生产逻辑和数字行动逻辑的叠加作用下，政党从组织化的“举党竞争”转向去中心化的“网红竞争”。在数字时代到来之前，随着政党意识形态的不断淡化，以及政治行动的议题化程度不断加深，政治选择日益与个体行动紧密捆绑在一起，不仅选民投票行为更加个体化，精英个体的行动空间也大为拓宽，突出表现为“明星政治”(celebrity politics)挑战科层传统，突破单纯以政党为整体单元的组织化竞争传统[59]。走入数字时代以来，“明星政治”进一步发展为“网红政治”(internet celebrity politics)。如果说“明星政治”是立足于娱乐化、商业化的媒体逻辑，为缺乏组织化支持网络的其他类型社会精英提供了进入职业政治领域的上升渠道的话，那么“网红政治”则是立足于数字化、社交化的媒体逻辑，为缺乏线下组织支持网络的草根意见领袖提供了变现政治影响力的线上动员平台机制[60]。具体而言，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X)等开放性的社交媒体不仅高度精准地复制了线下社会的复杂生态，又具有线下社会传播和线下政治动员无法比拟的信息传播和数据处理优势，从技术上大幅度降低了作为个体的“数字人”介入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成本，尤其是方便了精英和民众在个体层面上的点对点互动，以及在群体层面上的点对面互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去中心化的“网红竞争”重新定义了政治精英的生态结构，既降低了边缘政治精英和草根明星向核心精英圈层跃迁的适应性需求，也降低了精英领袖对封闭性成员组织的依赖程度。

“网红竞争”在打破政党科层精英的封闭性结构，为非职业化政治精英的偶发逆袭创造条件的同时，也推动了政党精英生态走向混合化。首先，“网红竞争”为党内精英开辟了一种轻资历、重名气的晋升路径。尤其对于新生代精英而言，可以缩短或者直接越过科层选拔阶梯，借助在社交领域中的“名人效应”脱颖而出，最终在朋辈竞争中实现卡位或赶超[61]。其次，“网红政治”植根于数字解放重塑下的民主伦理，为个人化的领袖政治开辟了更为友好的外部支持空间。政党领袖可以部分地从过度商业化的“明星政治”伦理困境中脱身，通过利用个人化的社交媒体账号公开发声，摆脱党内科层常规的制度约束，成为直接面向“数字人”的民主先锋或民粹煽动家[62]。尤其是对于执政党领袖而言，网红战略更是意味着掌握随时发动非正式的准信任投票的权力。譬如无论默克尔“脸书问政”还是特朗普“推特治国”，都是通过在社交媒体上公开立场先发制人，避开党内常规化的组织程序，绕过执政联合与朝野联合，迫使治理集团内部的否决者在争议性议题上与自己保持一致[63]。最后，“网红竞争”为组织化的政党竞争提

供了更具备混合化特征的选战策略。自2014年以来,印度人民党成功击败国大党并长期执政的关键,就在于紧紧围绕莫迪总理展开全党力推的个人化选战,通过把去中心化的“网红竞争”战略与传统的“举党竞争”战略结合起来,将自身打造为远比国大党要灵活错落、容忍差异的开放性社群生态[64]。意大利“五星运动”的实践更为复杂和精致。一方面,以政党领袖毕普·格里洛和中央党部的名义有组织地运营实时更新的社交媒体账号和领袖博客,实施基于算法逻辑的信息推送;另一方面,适度容忍其他明星政客和政治网红对本党政策立场进行个性化解读与传播,展开基于互动逻辑的多节点发散式回应[65]。

四、数字化政党的转型战略:视野、选择与风险

数字化政党的第二个分析维度是转型战略,主要涉及三个问题:其一,战略视野,即面对数字化的转型语境与工具选项,政党有什么样的适应性战略可供选择;其二,战略选择,即政党如何在不同的战略选项之间进行区分、选择、转换与混合;其三,战略风险,即政党的战略选择本身会面临哪些难以避开的非预期后果。

(一)战略视野

根据数字技术工具和传统组织工具的混合程度,数字化政党的转型战略大体上可区分为数字建构和数字革新两种类型。数字建构战略是本体论导向的激进型,放弃传统的线下组织和社交生态,转向数字化的信息渠道、组织平台和社交网络,利用数字化技术和数字化平台实现跨越式组织发展。数字革新战略则是工具论导向的温和型,欢迎网络化的线上组织和社交媒体,同时巩固传统线下组织和平面媒体,利用数字化技术和数字化平台实现渐进式组织革新[66]。

两种战略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如何看待线上平台和线下组织的关系。数字建构战略强调线上平台替代线下组织,侧重在线参与的过程价值,在极端的情况下,放弃科层制和党员制,成为开放式的平台型政党,譬如2015年难民危机大爆发之前在德国和瑞典盛极一时的海盗党,以及2018年主政之前的意大利“五星运动”。对于规模小、组织弱的新兴政党而言,严格的科层体系不仅不会带来规模管理上的效率和正向收益,反而会约束其行动自由。尤其是当政党还处在从社会运动、社会潮流中凝结聚集的阶段,往往会更倾向于保持可渗透性边界和去中心化结构,以吸引足够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67]。另一方面,新兴政党既没有组织化的历史负担,更谈不上组织化的力量优势,因此借助平台化的社交网络,走创新建构的道路,更能扬长避短。与数字建构战略不同,数字革新战略强调线上平台补充线下组织,侧重在线动员的工具价值,在极端的情况下,只是把政党的宣传橱窗升级为线上展台,如印度国大党在拉胡尔·甘地的领导下,自2017年以来锐意推行数字革新,但形式大于内容,无法从根本上扭转线下主导的组织传统,难以赶超在莫迪领导下数字化日新月异的人民党[68]。对于规模大、组织强的建制政党而言,科层化组织和基层党员群体是历史形成的团结传统和制度遗产。无论是搭建自营网络平台还是借助公共社交媒体平台,都不能以牺牲已有的线下组织优势为代价。相反,数字化手段被视作对线下组织模式的技术升级和配套补充,是保证有效组织壁垒和基本身份认同的加强性机制[69]。

第二,如何看待边缘议题的凝聚力。数字建构战略侧重边缘议题的代表潜力,尤其是那些社会支持度相对碎片化的激进议题,难以通过传统媒体渠道发声,却代表了被建制派政党有意打压或者疏于回应的群体诉求。对于立足特定议题的利基型政党(niche party)而言,可以借助数字媒体和数字平台之力,挖掘并凝聚边缘议题的代表潜力,挑战主流议题规制驯化下的政治禁忌和政治正确,推动议题拓荒、解禁或复兴,最终突破传统政党格局下的议题所有权分配结构[70]。换言之,无论是议题因其内容过于边缘、激进,或是线下支持者过于小众、分散,这些都并非不可逾越的发展障碍,相反,如果政党能够凭借出色的算力支持和网络互动,锚定议题并且站位突出,就可达到凝聚支持度和放大影响力的效果。和数字建构战略形成鲜明对比,数字革新战略强调边缘议题的整合潜力,涵盖尽可能广泛的议题领域,吸引尽可能多的选民支持,以保持政党在选举市场上的竞

争力。对于力求选票最大化的建制派政党而言，可以借助投票建议APP以及经营社交媒体账号等。一方面，改善自身立场和选民诉求的匹配度，拓宽议题视野，增强回应能力；另一方面，增强自身的议题所有权竞争能力，或主动或被动地慢慢改变对边缘性、争议性的禁忌议题所持有的排斥和拒绝态度，将其整合到主流议题框架中[71]。

(二)战略选择

对具体的政党而言，数字建构战略和数字革新战略并非泾渭分明、非此即彼的等价选项，而是会因政党的战略视野而异，因政党的生存环境而变。换言之，面对议题算法化、参与平台化、竞争网红化等数字冲击，政党采取哪种转型战略与相应的技术混合模块，一方面取决于政党如何认知和评估自身所承受的内外改革压力与资源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取决于政党根据具体议题和时空情境调整技术混合配比的平衡潜力。

第一，政党如何遵循制度结构层面上的路径依赖。其一，内部制度因素，即政党的组织遗产和组织现状[72]。政党的线下组织越是松散，越缺乏抵制内部变革的组织刚性，组织技术替代的阻力就越小，越容易采取数字工具来重组政党，典型如意大利“五星运动”；线下组织越是严密，组织刚性就越强，则越倾向于以数字技术手段来补充线下策略工具包，典型如德国社民党[73]。其二，外部结构因素，即政党在政党体系中的实力地位[74]。政党越是处于实力中心地位，抵制外部挑战的组织刚性就越强，尤其是建制派大党，无论执政还是在野，都难以放弃线下政治的资源优势，典型如印度国大党；越是处于实力边缘地位，组织技术替代的动力越大，尤其是新兴政党，则越倾向于采纳线上政治，谋求后发优势，典型如德国海盗党[75]。综合内外两种因素来看，线下组织松散的边缘性小党改革负担小，更容易采取激进的数字建构战略，而线下组织严密的建制派大党改革惰性强，更倾向于采取温和的数字革新战略。

第二，政党如何平衡政党民主层面上的张力关系。其一，转型过程是强调动员优先还是强调参与优先。如果秉承工具导向，坚持技术赋能，政党战略就更加侧重数字动员，强调数字技术作为信息传播渠道和社会动员手段的价值，致力于克服代议制民主因信息不充分、动员不广泛等而造成的代表缺陷。如果秉承目的导向，则坚持数字为王，政党战略则更加侧重数字参与，强调数字技术有助于突破海量协商、即时表决的技术瓶颈，致力于克服代议制民主因选治分离、治理俘获政党等问题所造成的参与缺陷[76]。其二，转型结果是造成数字平等还是形成数字鸿沟。数字平等是一种乐观预期，强调数字化能够突破时空条件和人口规模对民主协商和民主决策的技术限制，为数字解放的个体创造更为平等的政治参与机会。如果立足于数字平等的乐观预期，政党就会倾向于诉诸激进开放的数字建构战略，以求吸纳那些原先被线下政治所排斥和边缘化的群体，调动深度沉浸于数字生态环境中的年轻一代“数字人”参政问政的积极性，甚至寄希望于藉此可以扭转部分中间选民的政治冷漠态度。与之相反，数字鸿沟则是一种悲观预期，强调数字化并不意味着所有人自动成为均质化的数字公民。数字知识储备、数字产品消费能力、网络接入与使用权限等门槛条件成为数字时代的“强者武器”，从而造就新的社会不平等。如果立足于数字鸿沟的悲观预期，那么政党会倾向于温和保守的数字改良战略，致力于调整支持者的结构层次与辐射半径，控制线上政治和线下政治的混合比例，保持社交媒体平台和政党自营平台的分工平衡等。具体来说，一方面，防止因偏重线上政治而失去对“数字弱者”的回应性和代表性；另一方面，防止因过度依赖由网红政客、流量积极分子、匿名支持者所搭建的开放性成员体系，造成坚守传统身份认同的政党成员基本盘过度流失[77]。

(三)战略风险

政党的数字化转型结果不单纯取决于转型战略的内容与政党的战略选择。无论是数字建构战略还是数字革新战略，都不是指向预定结果的通衢大道。任何一种战略选择都可能伴生无法预见的风险，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导致转型发生偏航甚或脱轨。仅就政党的数字转型本身而言，相关的战略风

险内嵌于实时性、互动性和算法化的数字政治逻辑，潜藏于议题算法化、参与平台化、竞争社交化的数字转型语境。

第一种战略风险是危及政党组织自主的数字霸权。政治个体从“社会人”转向“数字人”的过程，一方面是超越线下时空局限的数字解放过程，另一方面也是落入“数字利维坦”之手的数字俘获过程。顾名思义，“数字利维坦”刻画了由数字技术孳生的一种新型系统霸权，主要包括提供信息基础设施的接入权、决定数据生产和推送的算法权以及打造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权。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一旦接入数字网络，只能选择默许算法权力的游戏规则，被动地参与数据信息的供给、搜索、跟踪、推送等各个环节，成为平台内容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成为被算法权力瞄准和俘获的被治理者[78]。政党也面临被迫臣服于“数字利维坦”霸权的风险。如果政党过度依赖甚至是依附于第三方平台，完全寄生于后者所建构的信息供需结构与社交网络生态，就难以保持自身的组织独立性和行动自主性。在极端的情况下，当社交平台放弃中立的仲裁者地位，或自行组建政党进场角逐，或公开地踩一方捧一方，都会破坏既有的公平竞争环境。譬如，近年来脸书、推特针对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社交言论，采取了从警示、删帖到最终封号等一系列不断升级的严厉举措，揭示出处于垄断地位的社交媒体并非一定是政党组织转型重生的助产士，反而可能有滥用平台的内容规制权力之嫌，通过选择性地制造政治网红的“社交性死亡”，对投身线上政治的某些政党及其领袖造成沉重打击[79]。

第二种战略风险是削弱政党决策弹性的数字刚性。作为混合化的数字化意味着一种以开放互动为特征的共生系统，允许海量的去中心化意见表达，容忍跨界渗透和立场切换，但也缺乏有效的共识凝聚机制和审慎的议题聚焦机制，导致难以形成持续稳健的行动基础。在前数字时代，政策决策因所占用必要的时空成本无法压缩，在面对内外冲击时，反而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保弹性。相较而言，在具有高度现场性的互动场景中，决策刚性大大增强，决策中减震缓冲的空间缩小，决策后容错纠错的难度也加大。对于政党而言，如果把自身行动决策完全交托于立足用户逻辑的算法战略，则易于陷入因议题转向、失焦乃至贬值而降低政策辨识度和立场公信力，削弱政策引导能力和组织抗震能力[80]。另一方面，当政党过度强调以流量用户替代科层成员，倚重由明星政客、流量网红、匿名支持者的个性化助攻，则会因流量政治缺乏稳定性，个性化助攻缺乏一贯性，导致耗竭自身的议题整合潜力和组织混合潜力[81]。特朗普2020年总统大选连任失利，“五星运动”2022年大选惨败，都是上述数字风险兑现的典型例证。

总体而言，无论政治生活的数字转向提供了什么样的技术选项，政党采取何种战略混合，数字化转型都并不保证政党能够如愿以偿，既无法确保政党克服既有的组织萎缩、认同下降、回应性弱等生存难题，更无法确保政党在党际竞争中占据身位优势。相反，各种非预期后果层出不穷，如数字鸿沟意味着新的参与不平等，数字霸权会造成政党丧失组织独立性，削弱其议题引领能力，数字刚性则导致决策容错纠错能力下降等等。这些现象都说明了一点，数字化转型在促进政党民主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也制造了新麻烦。

五、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当代政治生活的数字转向塑造了以实时、互动、算法为基本特征的全新政治逻辑，不仅推动“社会人”走向“数字人”的数字解放过程，更对当代政党提出了在技术上和伦理上进行转型调适的总体要求。本文提出数字化政党，作为一个方法论自觉的非类型学框架，反对单纯从工具论或者本体论的视角来理解政党数字化转型，拒绝使用“数字党”“赛博党”“网络党”“平台党”等简化冠名的类型学标签。回应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问题，当代政治生活的数字转向既不意味着政党的终结，更未创造一种全新的政党类型或者政党家族，而是推动政党普遍走向数字化转型，而这一转型的发生，既是一个多战略、多速度的可变过程，也是一个多层次和多元化的混合过程。

首先，从转型语境来看，体现为技术混合。数字化政党不再是封闭的、有边界的自生系统，而是开放的、互动性的共生系统。在议题算法化、参与平台化、竞争社交化的工具语境下，政党日趋转向外驱型的政策供给，认可开放性的用户服务逻辑，采取去中心化的“网红竞争”。

其次，从转型战略来看，体现为战略混合。数字化政党采取何种数字转型战略与相应的技术混合模块，一方面取决于政党如何认知和评估自身所承受的内外改革压力与资源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取决于政党根据具体议题和时空情境调整技术混合配比的平衡潜力。相比较而言，政党如果强调线上平台优先于线下组织，侧重边缘议题的代表潜力，乐观预期数字化会尽可能地推动数字平等，则更倾向于选择较为激进的数字建构战略，典型如线下组织根基较弱的边缘小党。政党如果强调线上平台补充线下组织，侧重边缘议题的整合潜力，悲观预期数字化会造成数字鸿沟与新的不平等，则更倾向于选择较为温和的数字革新战略，典型如线下组织传统深厚的建制大党。

最后，从转型前景来看，体现为结果混合。任何数字化转型战略都无法保证政党如愿以偿，而是会面临无法预期的伴生风险。就政党内部建设而言，数字霸权会造成政党丧失组织独立性，削弱其议题引领能力，数字刚性则导致决策容错纠错能力下降。就政党外部竞争而言，政党转型成败得失，并不完全取决于己方战略是否适宜得当，是具有先发优势还是后发优势，而要看其同场竞技的其他对手如何展开调适性的改变，以及各自改革调适能否增强自身的比较优势，尤其是相应的战略优势能否转化为稳定的选票与席位优势。

数字化政党开拓了创新性的研究增长点。必须指出，本文主要致力于搭建理论分析框架，除了在具体讨论中提供必要的简明实例作为佐证，并不侧重具体详尽的实证探讨。因此，未来亟待展开广泛的经验研究，以充分检验和挖掘相关框架的解释效度和应用潜力。正如本文指出，就其混合本质而言，数字化政党虽然本身不是一个类型学概念，但却是能够用来建构类型学范畴的顶层概念，有助于在经验比较的层面上去更好地解释差异化的混合机制。事实上，本文通过比较数字建构和数字革新这两种数字化转型战略，已经初步开辟了一项以政党为中心的转型竞争类型学研究议程，勾勒了政党的工具视野、战略考量与选择空间造成政党数字化转型差异的影响机制。但是，政党数字化不仅仅取决于单个政党自身的战略考量和路径选择，只有在以国家为中心的政党体系中，才能更好地把握政党数字化转型在经验中的结果差异。笔者通过一项经验研究，初步考察了竞争性政党体系中的政党数字化转型。依据政党组织传统的强弱程度以及政党体系格局的极化程度这两个维度，归纳了数字化转型竞争的四种典型模式。一是强组织传统和强极化格局下的“激进重组建制”模式，典型国家如意大利，激进的数字化政党“五星运动”打破了建制—边缘分野，甚至上台执政，从而推动政党治理联合实现重组。二是强组织传统和弱极化格局下的“建制吸纳激进”模式，典型国家如德国，秉承激进的数字建构战略的“海盗党”迅速崛起又边缘化，而基民盟和社民党主动诉诸渐进的数字革新战略重新取得优势。三是弱组织传统和强极化格局下的“数字弱党”模式，典型国家如美国，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其政党组织传统上都是高度去中心化的政治生态群落，本质上类似于网络和社会运动，与平台化的数字政治在运行逻辑上耦合互嵌、彼此强化，抵消了数字化转型对于政党竞争的影响力。四是弱组织传统和弱极化格局下的“数字强党”模式，典型国家如印度，人民党原本是低组织水平的地方性政党，借助数字转型战略做大做强，成为一党独大的全国执政党。简言之，转型竞争的类型学提供了比较政党研究的新视角和新命题。

展望未来研究，转型竞争类型学并不能取消数字化政党在方法论意义上的非类型学本质。相反，要充分解释数字化政党的结果混合及其影响，必须超越竞争性政党体系的教条自限。首先，数字化政党研究必须克服当前研究囿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性，把目光投向世界范围内的政党数字化实践，特别

是投向中国共产党这样具有卓越独特性的百年大党。更重要的一点，数字化政党研究必须跳出政党政治和国家治理彼此割裂无涉的窠臼，重点关注数字化的政党治理，特别是从理论上和经验上去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以“数字强党”引领“数字强国”的中国特色模式。只有认真挖掘、提炼和概括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党建引领治理的本土经验和本土理论，才能够超越西方政党民主研究狭隘局促的选举竞争定式，为真正世界意义上的政党数字化研究开辟更为开阔而深刻的视野，树立更具影响力和示范性的研究路标。

注释：

① Ralf Dahrendorf, Homo Sociologicus: Ein Versuch zur Geschichte, Bedeutung und Kritik der Sozialen Rolle, Zehnte Auflage, Wiesb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71, pp. 20—21; Deborah Lupton, Digital Sociology, London: Routeledge, 2015, p. 7.

②Andrew Chadwick, Jennifer Stromer-Galley, "Digital Media, Power, and Democracy in Parties and Election Campaigns: Party Decline or Party Renewal?",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Vol. 21, No. 3, 2016.

③Paolo Gerbaudo, The Digital Party: Political Organisation and Online Democracy, London: Pluto, 2019.

④Terry Flew et al., "Internet Regulation as Media Policy: Rethinking the Question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 Platform Governance", Journal of Digital Media and Policy, Vol. 10, No. 1, 2019.

⑤Anna Croon Fors, "The Ontology of the Subject in Digitalization", Rocci Luppicini, eds.,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Technoself: Identity in a Technological Society, Heyshey: IGI Global, 2013, pp. 45—63.

⑥赵一璋、王明玉：《数字社会学：国际视野下的缘起、发展与展望》，《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2期。

⑦Pippa Norris, Digital Divide: Civic Engagement, Information Poverty, and the Internet Worldwi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⑧高奇琦：《人工智能：驯服赛维坦》，第10章，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⑨Bruno Latour,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0—12.

⑩⑪Andrew Chadwick, The Hybrid Media System: Politics and 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47—48, p. 289.

⑫Philip Auslander, Liveness: Performance in a Mediatized Culture, 3r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eledge, 2022, pp. 26, 54—56.

⑬Taina Bucher, If... then: Algorithmic Power and Politics,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32—41.

⑭Anja Adler, "Liquid Democracy als Social Software für Parteien", Forschungsjournal Soziale Bewegungen, Vol. 26, No. 2, 2013.

⑮Seymour Martin Lipset, "The Indispensability of Political Partie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 11, No. 1, 2000.

⑯Richard S. Katz, Peter Mair, "Changing Models of Party Organization and Party Democracy: The Emergence of the Cartel Party", Party Politics, Vol. 1, No. 1, 1995.

⑰Russell Dalton, Martin P. Wattenberg eds., Parties Without Partisans. Political Change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⑱⑲丁辉：《弱竞争民主：当代西方政党政治嬗变与代议制民主的危机》，《国际政治研究》，2022年第4期。

⑳Paolo Gerbaudo, The Digital Party: Political Organisation and Online Democracy, pp. 58—61, 84—85.

㉑Andrew Chadwick, Jennifer Stromer-Galley, "Digital Media, Power, and Democracy in Parties and Election Campaigns: Party Decline or Party Renewal?".

㉒Katharine Dommett et al., "Are Digital Parties the Future of Party Organization? A Symposium on The Digital Party: Political Organisation and Online Democracy by Paolo Gerbaudo", Itali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Rivista Italiana di Scienza Politica, Vol. 51, No. 1, 2021.

㉓刘红凛：《技术革命驱动政党转型发展：历史逻辑与当代演绎》，《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3期。

㉔Helen Margetts, "Cyber parties", Richard S Katz, William J. Crotty eds., Handbook of Party Politics, London et al.: Sage Publications, 2006, pp. 528—535; Knut Heidar, Jo Saglie. "Predestined Parties? Organizational Change in Norwegian Political Parties", Party Politics, Vol. 9, No. 2, 2003.

㉕Wainer Lusoli, Stephen Ward, "Digital Rank-And-File: Party Activists´ Perceptions and Use of the Internet",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6, No. 4, 2004.

㉖㉘Paolo Gerbaudo, The Digital Party: Political Organisat-

ion and Online Democracy, pp. 4—6, Chapter 2.

㉗ Katharine Dommett et al., "The Digital Ecosystem: The New Politics of Party Organization i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Party Politics, Vol. 27, No. 5, 2021.

㉙Katharine Dommett et al., "Are Digital Parties the Future of Party Organization? A Symposium on The Digital Party: Political Organisation and Online Democracy by Paolo Gerbaudo", Itali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Rivista Italiana di Scienza Politica, Vol. 51, No. 1, 2021.

㉚ David Karpf, "Two Provocations for the Study of Digital Politics in Time",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Politics, Vol. 17, No. 2, 2019.

㉛Max Weber,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Tübingen: Mohr, 1922, pp 190—191.

㉜André Krouwel, "Party Models", Richard Katz and William Crotty eds., Handbook of Party Politics, London et al.: Sage Publications, 2006, pp. 249—269.

㉝ Giovanni Sartori, "Concept Mi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4, No. 4, 1970; David Collier, James E. Mahon Jr., "Conceptual Stretching Revisited: Adapting Categories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7, No. 4, 1993.

㉞Katharine Dommett et al., "Are Digital Parties the Future of Party Organization? A Symposium on the Digital Party: Political Organisation and Online Democracy by Paolo Gerbaudo", Itali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Rivista Italiana di Scienza Politica, Vol. 51, No. 1, 2021.

㉟Carsten Koschmieder, Oskar Niedermayer. "Steiler Aufstieg und Tiefer Fall: Die Piratenpartei Deutschland", Koschmieder, Niedermayer eds., Die Parteien nach der Bundestagswahl 2013,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13, pp. 209—235; Fabio Bordigno, Luigi Ceccarini, "Five Stars, Five Years, Five(broken)Taboos", Luigi Ceccarini, James L Newell, eds., The Italian General Election of 2018: Italy in Uncharted Territory,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p. 139—163.

㊱David Collier et al., "Putting Typologies to Work: Concept Formation, Measurement, and Analytic Rigor",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65, No. 1, 2012.

㊳㊵ Andrew Chadwick, "Digital Network Repertoires and Organizational Hybridity",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Vol. 24, No. 3, 2007.

㊳㊴㊶Andrew Chadwick, The Hybrid Media System: Politics and Power, pp. 16—18, p. 48, p. 239.

㊷Andrew Chadwick, "Digital Network Repertoires and Organizational Hybridity".

㊸Stuart Elaine MacDonald et al., "Issues and Party Support in Multiparty System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5, No. 4, 1991; éric Bélanger, Bonnie M. Meguid, "Issue Salience, Issue Ownership, and Issue- based Vote Choice", Electoral Studies, Vol. 27, No. 3, 2008.

㊹John R. Petrocik. "Issue Ownership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With a 1980 Case Stud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0, No. 3, 1996; Stefaan Walgrave et al. "The Associative Dimension of Issue Ownership",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76, No. 4, 2012.

㊺ Adrien Petitpas, Pascal Sciarini, "The More the Better? Cumulative Iasue Ownership and Intra-campaign Party Switching", Electoral Studies, Vol. 64, 2020.

㊻ Christopher Prosser, Jonathan Mellon, "The Twilight of the Polls? A Review of Trends in Polling Accuracy and the Causes of Polling Misses,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 53, No. 4, 2018.

㊼ W. Lance Benett, Alexandra Segerberg,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Digital Media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Vol. 15, No, 5, 2012.

㊽Diego Garzia et al., "Indirect Campaigning: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Voting Advice Applications", Bernard Grofman et al. eds., The Internet and Democracy in Global Perspective, Heidelberg et al.: Springer, 2014, pp. 25—41.

㊾Lorella Cedroni, Diego Garzia, Voting Advice Applications in Europe: The State of the Art, Napoli: Scriptaweb, 2010.

㊿Diego Garzia, Stefan Marschall, "Voting Advice Applications",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51)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https://www.bpb.de/themen/wahl-o-mat/326661/die-geschichte-des-wahl-o-mat/，2022年4月29日。

(52)Zsolt Enyedi, "The Influence of Voting Advice Applications on Preferences, Loyalties and Turnout: An Experimental Study", Political Studies, Vol. 64, No. 4, 2016.

(53)Garzia, Marschall, "Voting Advice Applications".

(54) Gerbaudo, The Digital Party: Political Organisation and Online Democracy, pp. 66—80.

[55] Chadwick, Stromer-Galley, "Digital Media, Power, and Democracy in Parties and Election Campaigns: Party Decline or Party Renewal?".

[56] Rachel Gibson, Stephen Ward, "Parties in the Digital Age—A Review Article", Representation, Vol. 45, No. 1, 2009.

[57] Paolo Gerbaudo, "Are Digital Parties More Democratic than Traditional Parties? Evaluating Podemos and Movimento 5 Stelle's Online Decision-making Platforms", Party Politics, Vol. 27, No. 4, 2021.

[58] Davide Vittori, "Membership and Members' Participation in New Digital Parties: Bring Back the People?",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Vol. 18, No. 4, 2020.

[59] P. David Marshall, Celebrity and Power: Fame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4.

[60] David Marsh et al., "Celebrity Politics: The Politics of the Late Modernity?",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Vol. 8, No. 3, 2010.

[61] John Street, "Do Celebrity Politics and Celebrity Politicians Matter?",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4, No. 3, 2012.

[62] Gerbaudo, The Digital Party: Political Organisation and Online Democracy, pp. 144—161.

[63] Axel Murswieck, "Politische Führung von Bundeskanzlerin Merkel in der Christlich-Liberalen Koalition", Reimut Zöhlnhöfer, Thomas Saalfeld eds., Politik im Schatten der Krise: Eine Bilanz der Regierung Merkel 2009-2013, Wiesbaden: SpringerVS, 2015, pp. 169—190; Ramona Kreis, "The 'Tweet Politics' of President Trump",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Vol. 16, No. 4, 2007.

[64] Nalin Metha, The new BJP: Modi and the Making of the Worlds Largest Political Party, Chenai: Westland, 2022, Chapters 7—8.

[65] Gerbaudo, The Digital Party: Political Organisation and Online Democracy, pp. 171—174.

[66] Christian Blum, Christina Isabel Zuber, "Liquid Democracy: Potentials,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Vol. 24, No. 2, 2016.

[67] Herbert Kitschelt, "Movement Parties", Richard S. Katz, Crotty William eds., Handbook of Party Politics, London et al.: Sage Publications, 2006, pp. 278—290.

[68] Nalin Metha, The New BJP: Modi and the Making of the World's Largest Political Party, Chapter 7.

[69] Susan Scarrow, Beyond Party Members. Changing Approaches to Partisan Mobiliz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26—35.

[70] L. Constantin Wurthmann et al., "Many Losers-One Winner? An Examination of Vote Switching to the AfD in the 2017 German Federal Election Using Voting Aid APP Data", Party Politics, Vol. 27, No. 5, 2021.

[71] Jae-Jae Spoon, Heike Klüver, "Responding to Far Right Challengers: Does Accommodation Pay Off?",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27, No. 2, 2020.

[72] Robert Harmel, Kenneth Janda, "An Integrated Theory of Party Goals and Party Chang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 6, No. 3, 1994.

[73] Cristian Vaccari, Augusto Valeriani, "Party Campaigners or Citizen Campaigners? How Social Media Deepen and Broaden Party-related Engagement",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Vol. 21, No. 3, 2016.

[74] Hui Ding, Die Demokratisierung der Parteiführerauswahl: Parteien in Deutschland und Grossbritannien im Vergleich, Wiesbaden: Springer VS Verlag, 2015.

[75] Paolo Gerbaudo, "The Platform Party: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Organisation in the Era of Big Data", David Chandler, Christian Fuchs eds.,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 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2019, pp. 187—198.

[76] Isabelle Borucki et al, "Die Digitalisierte Demokratie. Ein Überblick", Zeitschrift fur Politikwissenschaft, Vol. 30, No. 2, 2020.

[77] Andreas Jungherr, "Four Functions of Digital Tools in Election Campaigns: The German Cas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Vol. 21, No. 3, 2016.

[78] 王中原:《算法瞄准如何重塑西方选举——算法时代的选举异化及其治理》,《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5期。

[79] Meysam Alizadeh et al., "Content Moderation as a Political Issue: The Twitter Discourse Around Trump's Ban",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Description, Digital Media, Vol. 2, 2022.

[80] Igor Calzada, John R. T. Bustard, "The Dilemmas Around Digital Citizenship in a Post-Brexit and Post-pandemic Northern Ireland: Towards an Algorithmic Nation?", Citizenship Studies, Vol. 27, No 2, 2023.

[81] Annelot Prins, "Analysing Celebrity Politics from Obama to Trump", Celebrity Studies, Vol. 11, No. 4, 2020.